

文 革 博 物 馆 专 集 (二 十 四)

◇ 斗争为时大半年

“反英抗暴斗争”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展开的，又叫“五月风暴”。由于斗争主要是在左派群众和港英政府之间进行，一般人又称之为“左派暴动”。

“五月风暴”的导火线是新蒲岗人造塑胶花厂的劳资纠纷。五月六日工人罢工，港英镇压，殴伤拘捕多人。左派动员前往支援，后来更转向港督府游行抗议，花园道上每天白天游行队伍不绝，大字报贴满港督府门前。

十六日，左派宣布“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领导群众斗争港英。

二十二日，前往港督府的游行示威队伍受到警方阻止，打人捕人，二百多人被打伤，很多人被拘捕，送上法庭，投入监狱。港府当天宣布了紧急法令（后来并出动军队参加镇压）。

第二天，巴士、电车、小轮、电厂、煤气……工人陆续罢工。六月间又有两次“联合大罢工”，还有四天的局部罢市，但都不如预期的规模之大。

左派群众纷纷游行集会，又以土制炸弹和假炸弹作“真假菠萝阵”，在街头困扰以催泪弹、木弹对付他们的军警，整个城市气氛紧张。

七月，九龙新界边境的沙头角，中、英双方发生相互枪击事件，中方死一人、伤八人，英警死五人、伤十二人。

八月，接近左派的《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新午报》被查封，负责人等三十多人被捕。

九月、十月以后，变相武斗的“真假菠萝”才销声匿迹，局势逐渐恢复正常。整个斗争的紧张时期延长了半年以上。

◇ 仿效文革搞运动

《人民日报》出版的《香港大事记》中，在“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这一大事上，记下了这样一笔：“仿效国内‘文革’方式，展开了群众运动。”虽然只是寥寥两句话，却已经画龙点睛。

在香港这样一个地方，劳资纠纷可以说是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的，只不过有大有小而已。何以新蒲岗塑胶花厂这一件就这么“大件事”，需要广泛发动群众，轮番前往支援斗争？需要发动游行示威，一直威胁进港督府？

港英非无“暴”，只是原来较小，更大的“暴”是被激起来以便去“抗”的。

◇ 斗垮澳葡，操练兵马

“抗暴”的准备早就有了。地点在澳门，时间是一九六六，“文革”开始之年。那一年，澳门发生了“一二三事件”，掀起了反对澳葡迫害的斗争，左派发动群众斗澳葡，斗进了澳督府，终于把澳葡斗得低了头，甚至情绪低落，有意“走头”了，后来不知道是怎么把它“挽留”住的。

“文革”初展之年在澳门大获全胜以后，港澳工委毫不放弃这个教育干部和群众发扬战果以利再战的机会，就在香港组织了一批又一批的群众，到澳门去参观学习，学习那边“一二三斗争”的胜利经验。这是操练兵马。

操练有了，这就要捕捉战机了。新蒲岗送来的机会真是“机不可失”。

◇ 领导指示：宣传毛思想

为了配合“文革”，只是反对港英迫害还不够旗帜正大鲜明，还得硬加上了一条罪名给敌方：不许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神圣权利”，左派有最响亮的理由，理直气壮地跟港英进行这一场斗争。

事实上，在香港没有人禁止读毛主席的书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左派报纸不但天天在宣传，而且还开辟专版，增设学习的副刊，哪里受到港英的干涉限制呢？但领导既然这样指示，我们也就照样宣传了。这就使得斗争披上了吓人的虎皮。

我们也就奉命仿效“文革”的方式，胸挂像章，手持“宝书”，口头和笔端都充满毛主席语录。最左的左派，在最左的时期，一段几百字的报导，也非有三段语录不行。没有，或少了，排字工友中的积极份子会退回原稿，要你加上，否则这关就通不过。我这是听友报说的，说的人说得津津有味，不过我自己却没有过这样的“把关”经验。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有成为“语录狂”，却成了“像章迷”，到处搜求，收藏数以千计，还天天在报章上写至今看来要觉脸红的《像章小记》专栏。

被查封的三报负责人中，有一位朋友却是“毛主席诗词迷”。他在被捕受审时，在法庭上以藐视敌人的豪气，不屑答辩，只是朗诵毛诗，如“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之类，表示根本不把法官和他的审讯与判决放在眼里。当时我们都认为他是英雄，今天尽管不免觉得有可笑，却还是佩服他的勇敢。

◇ 一场错误的斗争

香港左派原已提出“港英不低头就走头”的口号，得到这样的鼓励，就更加趾高气扬。

这就苦了一直在管理香港工作的周恩来。他坚持对香港“长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基本方针，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对港英“盘马弯弓故不放”的具体方针，以限期停止的命令大力制止了香港的“武斗”。

时至今日，“反英抗暴”已经证明在当年只是一场错误的斗争。当年不是要斗得英国走，而是要它放心留。收回香港要留到三十年以后的今天，而且是英国“行乎其所不得行，止乎其所不得止”的结果。

□ 转载自 ACT newsgroup

~~~~~  
【不堪回首】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某红学家制造的一场文字狱

• 穆 欣 •

〔《新闻自由导报》编注：原《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在《传记文学》一九九五年十二期上发表《三十年不言之言》一文，现摘如下。本刊编注：文中不点名的

“某红学家”是指曾因为对《红楼梦研究》展开批判而受到毛泽东表扬的文学评论家李希凡。】

# ◇ 一张置人于死地的大字报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就是一场恶浪滔天的文字狱。一篇文章从政治上宣判一个人的死刑，乃是江青一伙的“发明创造”。而且从某红学家针对我所写的大有来头、“威力无穷”的大字报所造成的后果来看，一张大字报也能置人于死地。

一九六六年年底，当江青一伙准备掀起全面夺权风暴的时候，又叫蒯大富从清华大学“井冈山”、财经学院“孙大圣”两个造反派组织调派红卫兵进驻报社。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某红学家（他和光明日报社造反派始终保持密切联系）把他写的大字报《穆欣是反革命两面派》贴到光明日报社，“揭发”我所谓“反对京剧革命、辱骂江青同志严重罪行”。他拿三年前——一九六四年六月间《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触犯江青的文章来算老帐，一面炫耀他与江青非同寻常的关系，吹嘘当年江青曾为此事和他“谈了三小时”；一面造谣对我诬陷，说他曾经亲自听到我骂江青“有神经病”。

某红学家这张大字报贴出第二天——一月十八日，江青立即下令逼我回光明日报社“参加运动”、“接受群众批评”。（在此之前穆欣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见 z k 9 6 0 6 e 所载叶永烈撰《王力谈五·一六通知和中央文革的产生》一文——本刊编注）造反派对我进行的第一场批判，就是从某红学家大字报“揭露”的“辱骂江青”一事开始的。后来据王力说：“因为有人揭发穆欣在‘文革’以前说过江青有精神病，江青就说他是叛徒，让我派人调查。我调查结果说不是叛徒，江青不满意我这也是原因之一。”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夜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安徽来京代表的会议上，当众诬陷“穆欣是特嫌”的话与此对照，王力所讲的这些情况是可信的。从此以后，江青和叶群勾结起来，对我的迫害步步紧逼，终于将我关进牢房。直到“四人帮”垮台，这一条“罪状”才抹掉。

# ◇ “神经病”的渊源

（一九六四年，）首都各报和戏剧界都很热情地宣传现代剧观摩会演在北京开幕，对参演的剧目一视同仁。江青“指导排演”的《智取威虎山》的评论较少，而且没有北京作者写的。我报《光明日报》记者虽曾多方约稿，没人愿写。最后方得中国戏曲研究院林涵表允写一篇。编辑部根据中宣部有关同志意见，请他本着百家争鸣精神，不妨提出问题，引起讨论。

林涵表写了《“智取威虎山”观后漫笔》，对这出戏基本上是肯定的、鼓励的。同时也对改编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在表演艺术方面，指出它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某些地方还可以加工和再探讨”。哪知见报后张春桥看了竟十分恼怒。

张春桥又将此事告诉江青。江青看了这篇文章，即向中央宣传部大发雷霆，并且提出要由我写文章批评林文。这事转达到报社，当时感到这是小题大作，又因自己对戏曲外行，也没有看过这出戏，难以从命，就请常写文艺评论、这时又在这次会演报导办公室负责组稿的张绰写一篇。张绰很快写了《在新的高度上塑造正面人物形象——评京剧“智取威虎山”》一文。

江青迫不及待地催问报社写的这文章，索取文章的清样看了，她与张春桥合谋，又通过中宣部向报社提出：须由穆欣署名发表。这使我更感为难。因为我从不在

别人写的文章上署名，而且我连这出戏都没有看，也无资格与人争论，说长道短。当时就对中宣部据实相告，恳切求免。在那样的时候，江青一霸，无人敢惹。有关同志打回电话，以四位副部长的名义劝我署名，以免这个女人纠缠不休。这样，我便违心地署上名字，于六月二十五日和张绰联名发表了这篇文章。

七月二日下午，江青约我到中南海颐年堂谈话。见面的时候，还是从林涵表的文章谈起，虽然报上已经发了张绰写的文章，但她余怒未消，还要恶狠狠地骂上一阵。然后，指责“京剧没有党”，说《海瑞罢官》反党，《红灯记》“不按我的意思改”，《朝阳沟》“四不像”，“怕连豫剧也不承认它，应按京剧语言、音乐改成京剧剧本”。此外，又从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骂到苏联的《静静的顿河》、法国的《巴黎圣母院》，从萧洛霍夫骂到雨果。还吹嘘说，许多问题是她这个“哨兵”先发现，然后告诉毛泽东。说她发现《武训传》有问题，就写社论批判，“主席见我写得太吃力，拿过去改过才发表的。……”许多事都吹得没有边际。

这场谈话，前后两个钟头。江青信口开河，东拉西扯，几乎没有让我开口说一句完整的话。直至谈话结束了，也还没有弄明白，她究竟为什么要约我到这里来？为什么要向我说这样一些话？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摸不清她的性格，只觉得她嬉笑怒骂无常，情绪易于激动；而且东拉西扯，有时前言不搭后语，有点像书本上描写的“歇斯底里”，不像一个正常的女人……因此，回到报社，有人问到谈话的事，我就脱口而出说：“没见过像她那样易于激动的样子，不知是不是脑袋有病？”

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人们认为这桩公案到此总算已经“了结”。

#### ◇ 冤狱八年，家破人亡

不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来，某红学家得知此事，却把我在报社说过的话“翻译”成“江青有神经病”，用作讨好江青以便将我置之死地的情报，然后跑到报社来贴出这张杀气腾腾的大字报。

大字报作者先为“旗手”唱赞歌，然后把林涵表这篇内容正确的文章定性为“大毒草”，而将在报上发表这篇文章的事定罪为“京剧革命中的一个突出的反革命事件”，一口气点了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华君武、陈笑雨、唐平铸、林涵表、穆欣、张卉中十个人的名字，还分别强给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叛徒”、“反革命两面派”等种种大帽子。

这个名单里的张卉中，是我的妻子。她是光明日报社文艺部记者，因林涵表这篇文章是办公室派她去约的稿，某红学家就在大字报上对她进行诬陷。张卉中因此被加上了组织“大毒草”文稿、“破坏京剧革命”、“反对江青”的“罪名”，遭到造反派多次的批斗、陪斗，并被殴打受了重伤，后又经历八年冤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终至含恨死去。

被这张大字报点名诬陷为“大毒草”文章的作者林涵表，从此遭受到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对他恣意诬陷，残酷打击，受尽折磨；被这张大字报诬陷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著名漫画家华君武，也遭受了长期的批斗，残酷的迫害；而被这大字报诬陷为“叛徒”的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陈笑雨，本是某红学家的顶头上司，则因不堪忍受残酷迫害含恨而死，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唐平铸也遭受到长期的批斗、残酷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九月我被投入监狱，我和张卉中两家，先后即有十二人被关押过，四人致死（张卉中和她母亲均受折磨致死，我的父母年迈，因受惊吓病死）、二人致疯、一人致残。在光明日报社工作的同事中，有学术部编辑詹铭新、夜班编辑室

美术编辑陆俊培、驻浙江省记者高正生等同志，都在这场浩劫中长时间遭受批斗，因为不堪忍受报社“造反总部”的残酷迫害含冤而死；有的同志因遭造反派残酷批斗而精神失常。

我主持《光明日报》工作期间，许多仅在这张报纸上发表过诗画文章的作者，竟也受到牵连，被诬陷为“穆欣的黑关系”而遭受到没完没了的揪斗。

#### ◇ 投靠江青的供状

经过八年冤狱，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我终于离开秦城回到家里。人从狱中出来了，“官司”远没有了结。人们告诉我：贴了诬陷我的那张大字报不久，江青就“接见”了那个红学家。从此以后他就“发”了。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九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要塑造典型》一文，维护江青提出的违反典型化创作原则的“三突出”，并且胡拉乱扯，竟在这篇文章中七次点名攻击诬陷邓小平。有意思的是，他在这里给邓小平捏造的“罪名”，竟然是“对革命样板戏的恶毒攻击”。

有不少同志问过我：这个红学家自己也说和你“并不熟悉”，过去无冤无仇，他又从来不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和这个报社也无关系，他为什么突然送来这张大字报，把你弄得家破人亡？

某红学家如此卖力气对江青效忠，原因何在？不妨根据当时的形势作分析。在这张大字报中，某红学家说到他“辜负了……江青同志对我的培养和教导”，“深深感到愧对……江青同志的关怀和培养。”这不是一般的“客气”套话，而是具体有所指的。

江青多次当众说过，当她决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这出戏时，先曾找过这个红学家撰写批判文章，因他不愿意写，她又到上海去找姚文元写的。某红学家在“四人帮”垮台之后，也爱拿这件事当作资本，到处宣扬。

本来，某红学家当时不写这篇文章是对的。假如他能坚持这种态度不变，是会受到人们尊重的。只是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某红学家发现他这一次打错了算盘，风向没有看准，“深深感到愧对”江青。“有负于江青同志多次耐心的启发和教育，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当时某红学家正是带著这样痛悔、负罪的心情，给江青写了不少进行剖白、失悔认错的书信。但江青对他不肯轻饶，长久不予理睬。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她打电话叫戚本禹找某红学家谈话，转达她对他的严厉批评。戚本禹从中捣鬼，后头改叫我出面找某红学家谈。推也推不掉，我就约他到钓鱼台谈了一次，把江青的话照实告诉了他，有些话是很难听的。看来，某红学家对于这次谈话感到气恼，耿耿于怀。江青在某红学家贴出诬陷我的大字报之前，仍旧对他不予理睬，拒绝见他。直到他来光明日报社贴了这张大字报之后，江青方才饶恕了他。有人看到，江青同他见面时“情绪激动”，两人都不止是“热泪盈眶”，而是“泪流满面”的。自从得到江青谅解之后，某红学家重整旗鼓，大张挞伐，写了一篇又一篇大批判文章，取得了江青的谅解并且经她挥泪安抚以后，为表忠心，格外来劲，他又连续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攻击诬陷革命作家和文艺领导干部。

□ 转载自《新闻自由导报》第211期

~~~~~

【文献资料】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大约1967年8月)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个阶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年布局，第二年争取胜利，把临时权力机构建立起来，搞思想革命化，第三年是收尾。当前主要是搞大批判，实行大联合，三结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策略问题上讲，可分为四个阶段。

姚文元文章的发表，这是个讯号，这个讯号一出来后遇到彭真等的坚决反对，连我提议印小册子的意见也完全否决了。所以我只好主持起草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已明显的提出路线的问题，也提出了两条道路的问题。当时大部分人认为我的认识过时了，有时只有我自己同意我的意见。后来将此精神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我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支持，但许多同志是不通的，李井泉不通，刘澜涛也不通，那只好走着看吧！由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重点在六六年十月、十一、十二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对这条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面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觉的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今年一月份上海工人起来了，全国工人起来了，农民也起来了，一月风暴席卷全国。运动的发展证明了主力还是工农，兵只是穿军衣的工农，工农兵到底还是工农，广大的工农起来才彻底的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

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样一个革命运动的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民主革命的五四运动，是革命知识分子先觉，而首先发起的，但很快北伐，而后有长征，这些革命风暴全是工农为主力军。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算第二阶段。从一月风暴、夺权、大联合、三结合，这可算是第三阶段。一月风暴以后，广大工农兵虽然促进了一下大联合，当时中央也想迅速大联合，但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泛滥出来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却破坏这个形势。各个阶级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既然阶级斗争规律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捏不成个联合的，捏成的联合很快就会分裂，不再捏了，步子不得不放慢些。

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专政》发表以后，运动是属于第四个阶段了。这是一个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这里不能不顺便谈一下受蒙蔽的看法问题，受蒙蔽的人大部分是工农及党团骨干，但我们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所以对一时受了蒙蔽的人也要相信，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考虑。

工农兵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有直接接触，又加上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打着中央指示旗号下去的，加之广大工农兵及党团骨干又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所以他们容易受蒙蔽，受了蒙蔽改了就是了。现在阶级斗争盖子既已揭开了，真正用马列主义武装了广大工农，这个物质力量是强大的。向来知识分子比工农先知，他们也显得灵活善变一些，但往往有一定的投机性。革命的知识分子要想革命到底，则必须在劳动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因为包括青年学生在内，几十年来受的教育基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已溶化在他

们的血液中，不努力改造世界观，事物要走向它的反面。现在仍认为从党内到党外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看法是否过时了，请大家研究。所以在这个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要强调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

二、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是当前伟大的战略部署。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快结束，而是更深入、更大规模的开展起来。更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宣传十一中全会，要好好讲成绩，讲方向，把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打倒。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打倒修正主义，它就要复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向前看，这个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有些是钻进党内窃取领导地位，他们是一切牛鬼蛇神的支持者和包庇者。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常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当幌子，在“但是”后面大作文章，那些打着红旗的人更加阴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我个人认为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敌的斗争、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谈过应该上纲，这个纲要针对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很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年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各地很乱，这里乱，那里也乱，没有什么关系，象武斗也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了，就好解决。这次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最小的，成绩是最大最大的。

军队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他们从实际斗争中体会到这个问题，支持革命群众，支持左派组织，不但看到社会各方面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看到阶级斗争，军队里也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阶级斗争。军队通过支左，也同样把问题暴露出来，从而加强军队，提高我们军队的思想水准。

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好，七闹八闹一定会闹出个名堂来，可以闹清，不管怎样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全国大闹，那里有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特别是反对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开快车要翻车，要听打招呼，当前主要是大联合，三结合。把坏人挖出来，牛鬼蛇神挖出来，党组织的恢复，各级党代表大会要召开，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我看大体上要明年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有疲劳的感觉，不要想脱身。

当前大联合的阻力来自二个方面：一个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个是造反派内部的山头主义、风头主义、不愿搞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要很好的领导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关于解放军，还是要拥军爱民的口号。武斗问题，各地报来情况很具体，一查没有那么多。武斗是有的，但有的虚报，好比报灾情似的，想多要些“救济粮”，干部问题，还是要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各地还是有站出来的，大联合，三结合、支左是坚定不移的原则。夺权、军队、干部是当前三大问题。已经夺权的，掌权的是当前大问题。抓住这个问题就能体现大方向，否则大方向就落空了。大批判要抓，要抓出有质量的东西，《红旗》已发表

了一批有质量的文章。

目前要把大批判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把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批判本地区、本部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整个报刊的重点是刘、邓、陶、彭、罗、陆、杨。在军内批判重点是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瑞卿。

三、革命造反派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工夫

在这个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要强调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作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一问大家：你说由社会主义到底如何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所以要保证今后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工夫。

看来大联合必须要两个前提，一个必须经过斗争产生的联合，才是巩固的，因为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有人说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我看不是那么酷爱吧！中国人还是好斗的。

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那么乱用。革与保是有其强烈的阶级性，对革命的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显得更革命一些，但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小团体主义的东西。

五四时代的风流人物，有影响的人物，五四运动的右翼如胡适，后来他成为美帝的走狗。五四运动有名的陈独秀也成为反革命，当时李大钊的文章并不多，但他埋头工作，反成为革命左派。还有鲁迅，当时他重视社会调查，独立思考，后来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要做昙花一现的人物，要埋头苦干、善于思考，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指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四、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二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法国，现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迫着我们走自己的道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美帝国主义更加孤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祸首，全世界人民，美国人民都反对它。苏联修正主义也更加暴露。特别是这次中东事件，苏修也要采取赫鲁晓夫那一套，本来他派往阿联的军事专家两千多人，先是采用冒险主义，把军舰开去了，说服阿联不要先出兵，同时用热线告诉了约翰逊（赫鲁晓夫那时还没有热线），后来约翰逊很快告诉以色列实行了突然出击，把阿联百分之六十的飞机都消灭在地面上。苏联援助阿联一共二十三亿，最后阿联投降了，停了战。这是出卖民族国家的又一大暴露。

目前许多地方反华，形式上好象我们孤立，实际上，它反华是害怕中国的影响，怕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怕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华是为镇压国内的人民，转移人民对它统治的不满。这个反华是美帝、苏修共同策划的。这不表示我们孤立，是我们在全世界影响的大大提高，它越反华越促进人民的革命，这些国家的人民认识到中国的道路是解放的唯一道路。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现在可以公开给他们武器，

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的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

□ 原载《韶山》编辑部 转载自《四大广场》

~~~~~

【史海钩沉】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独立工会“全红总”

• 方 圆 •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西直门内大街一条小胡同内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楼拐角的一个房间里，“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诞生了。提起“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也许年轻一代不太熟悉。但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特别是海内外研究文革史、工运史的学者，不应该忘记“全红总”在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所掀起的汹涌波涛——也就是中共官方所称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

刘国凯先生在其著作《文化革命简析》中说：“六六年十二月下半月到六七年一月初，一股来势极为迅猛的风暴顷刻间席卷全国，这就是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积郁在广大群众胸中多年不敢讲的话，不敢提的合理要求，此时都如开了闸的洪水汹涌而出。……多年的积愤如堆积已久的干柴，一点火星即成熊熊之势。……六、七月份挨资反路线整的人在群众中毕竟只占少数，而多年来在经济待遇上，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受到不合理对待的人相当多，因此这个行动比单纯的批资反路线要猛烈得多。这才是真的群众运动，它发自群众的内心，是千百万人不约而同的呼喊。”

龚小夏女士在《文革及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一文（见 z k 9 7 0 4 b——本刊编注）中提到：“一九六六年秋冬之际，有一个名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组织活跃在北京和全国各地。这个组织发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工人运动：它组织起大批在工矿企业中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的临时工与合同工，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中央文革曾经鼓动这一组织去冲击劳动人事部门，但在发现它并不热衷于去揪斗“走资派”而是试图争取工人的利益之后，就对它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在我们谈到一些学者专家对“全红总”的正面评价的时候，也要看另外一些学者的相反评价。大陆王年一先生在其著作《大动乱的年代》的“经济主义歪风刮起”一节中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由极少数合同工、临时工凑合起来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在北京成立，其头头是王振海等人。十二月四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称：‘我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全红总’的头头揪斗领导干部，绑架工作人员，通知各分团要求补发工资和赔偿损失。顷刻之间，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经济主义歪风。”

徐友渔先生在日本出版的《中国研究》今年八月号发表的《关于“两个文革”说》一文中说：“文革中，某些社会集团确实提出过自己的利益要求，比如有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福利待遇，临时工、合同工要求转正，六十年代初从城市，工厂压缩回农村的人要求回城，下乡知识青年要求回城，他们把这些要求包裹在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口号中。为了利用这股社会力量，江青等人曾接见过他们的代表，表示支持他们提出的要求，各地造反派组织也曾容纳过他们，利用他们去干最危险的事。但中央很快就抛弃了他们，取缔他们的组织，宣布他们的要求不

合理，造反派组织也自愿或不自愿地与他们划清了界线。他们的活动不论从规模、影响、持续时间看，都称不上是工人运动或市民运动。……说造反派组织之所以具有政党性质，是它们有跨省市的特征，这是不确实的。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取缔‘全红总’等为非法组织，逮捕其头头。”

中共官方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大事辑要》针对“全红总”作了这样的评价：由于江青在一九六六年底讲话煽动临时工、合同工造反，并提出一些不合理的经济要求，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大批工人外出，闹转正，闹复工，闹工资福利待遇，闹增发劳动保护用品和保健食品等，从而刮起一股经济主义歪风，严重地冲击了国家财政经济。……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指出“全红总”，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取消。……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

笔者之所以花这些篇幅摘录前列关于“全红总”的论述，目的之一是，向年轻的一代民运精英尤其是目前尚在从事大陆自由工运的志士仁人介绍“全红总”这一组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还在从事民运和工运的朋友们，应当重视当代中国自由工运史的研究，具备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或知识。而在中共的封锁下，相当一部分人对此知之甚少。正如陈佩华在其《革命乎？组合主义乎？——工人及工会在后毛泽东时期》一文中所说：“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都以为一九八九年是中国工人第一次抗议共产党。反之共产党精英则痛苦地知道：这已是中国人阶级第五次（而有时是在官方工会领导下）起来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利。这种普遍缺乏关于早期抗议运动的知识表明共产党在控制中国人民了解现代历史方面的成功。可以说他们巧妙地贬低甚至抹去了民众对工人早期抗争的集体记忆。”

目的之二是，在前面摘引的海内外学者对“全红总”正反两面的评价和海峡两岸官方对“全红总”完全对立的描述中，我以为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人们思考：

一、“全红总”在文革中的抗争算不算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它和当时红卫兵运动、造反派运动有何区别和联系？

二、“全红总”的抗争是否具有独立性？“全红总”属于什么性质的组织？

三、“全红总”是不是中共上层斗争的产物？它和当时的中共上层斗争有无互动关系？有何互动关系？

四、“全红总”的抗争对文革历史和当代中国自由工运有何影响？当前的中国自由工运人士应从“全红总”身上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由于笔者是“全红总”发起人之一和“全红总”的领导集体——“五人小组”的主要成员，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见证这段历史的责任。由于关于这段历史的拙作尚在修改中，谨以此文解答一些急于了解“全红总”情况的朋友们的问题和纪念中国自由工运的先驱——“全红总”成立三十周年。

## 一、《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和“全红总”的筹建

“全红总”的出现是和《论临时合同工制度》这份油印传单分不开的。正因为这份传单的传播和媒介，“全红总”的几位创始人才互相认识最后走到一起。自从我七八年底平反出狱后直到现在，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我都一直在找寻这篇文章而未果。直到最近，在澳洲国立大学图书馆，我才发现一篇《现有的合同工制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此文刊载于六八年二月三日广州印发的《劳工战报》。而《劳工战报》则是由“广州市印刷系统红色劳动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发行的。这份《劳工战报》发行在“全红总”已被打成“反动组织”近一年之后。当时我正因“全红总”一案被关押在贵阳市看守所吃牛皮菜。尽管时光已逝去三十年，我读

到此文仍然感慨万端和欣慰不已。一是可以看出当年的自由工运并未因“全红总”被中共残酷镇压而消失。二是在这篇文章中，可以大约看到《论临时合同工》一文的影子。《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并非在文革期间写成。它完稿于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当时给这篇文章提供过重要意见有李伯特。当时李伯特和我都是合同工，李伯特十九岁，我十七岁，可以说是两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

李伯特和我自幼相识。因为父辈都是国军将领且被中共关押，所以我们从小就在中共一党专政的重压下长大。李伯特和我及我们周围的一批青年人，都同属到六六年为止的青年人，也可以说大部分属于“老三届”。我们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或属于“平民子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父母长辈和亲戚被中共“杀、关、管”。对我们这些在中共阶级斗争的苦水中泡大了的青年而言，从来就不认为中共是什么“正统”。我们从小在家庭的熏染下，一直认为中共依靠欺骗和暴力非法夺取政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不分清红皂白地把中共一切官员都看成没有教养、没有文化的“土包子”。我们从不认为中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我们认为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法统的正是败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我们的长辈告诉我们，中共的胜利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如同落后的满族文化战胜丰富的汉族文化。孙中山先生才是我们崇敬的国父。因为孙中山先生是基督徒，我们相当一部分人从小就受洗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因此，我们从小认为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只有神才是权威，才是全能的。人，不论是什么人，包括孙中山、蒋中正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是有限的。而在我们的圈子中，一般称毛泽东为“毛匪”、“老魔头”，而称蒋中正和周恩来为“老蒋”和“老周”，略带一点敬意。因此，基督教文明中的平等、博爱、谦卑、原谅敌人等概念在我们头脑中从小生根。我们绝不像有的学者武断地认为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的人，一定在极权文化的熏染下形成所谓“威权性格”——即是对权威的奴从和自己也想成为权威。当然，在中共一党专政的那个极权而残忍的社会中，有相当大的一批人的确具备“威权性格”——而不论其出身如何。这批人在大陆的的确确占了人口的很大比例。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仍然有少数人并非如此。这少数人在大陆人口比例中占的比重虽说很小，但对于当时的人口基数而言，其绝对数量也是惊人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读的书逐渐多了，大多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一些文学、政治、哲学著作。在我们那个年代，也就是文革初期“破四旧”以前，由于中共还没有在文化领域实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还有一点宽松。在我的家乡贵阳，出现了中共建政后的第一批民办夜校和夜大学，我虽然当时只有十四岁，也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和自己的几个早熟的小伙伴进入了贵州师范大学（当时叫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王梦渊和他的儿子王希龄创办的“黔灵中文速成大专班”，用一年的晚间“速成”中文系四年的课程。

六十年代初叶的中苏共大论战，吸引我们这批青年对马列著作发生兴趣。而中共批判苏共的“三和两全”——即“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全民国家、全民党”很合我们的胃口。苏共批判的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个人崇拜，不正是中共在大陆的丑恶统治的写照吗？是中共还是苏共搞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为什么在十几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统治思想？这些问题使我们这些青少年，在知识仍然非常贫乏的状况下，深入到那艰涩的马列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当时已经翻译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都尽量找来阅读。

我们还订阅了当时在布拉格出版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刊物——《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在这些刊物上，我们感受了当时已经出现的人类历史进步的主流——和平和包容。而当时中共猛烈抨击的凯恩斯的“人民资本主义”则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我们现代西方先进理论的启蒙教育。当时对我们影响较深刻的除了马列著作外，还有相当一批西方思想家，特别是卢梭的作品中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等等。对这些书籍的阅读和

讨论，无形中形成了类似于八十年代的“读书会”性质的圈子。

由于中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和我们也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必然的，因此，我们开始对中国工人运动及其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一九六四年中共在“四清”运动中贯彻所谓“阶级路线”，我们这些父兄被“杀关管”的子女不论成绩和表现再好，也被扫出学校大门，被中共“阶级斗争”的铁扫帚扫进了社会的最底层——被歧视被剥削最甚的临时合同工队伍。当时，李伯特成为贵阳市建筑公司的合同工，我则成为修筑贵阳磊庄机场的临时工。因此，我们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痛苦有了切身的感受。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们不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感兴趣，而且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实产生了变革的向往。从一九六四年底开始，在李伯特的二哥帮助下，我和李伯特开始搜集中共官方有关统计数字，搜寻有关“两种劳动制度”的资料，并由我执笔写作《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为“全红总”的出现作了我们当时预料不到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文革开始后，我们这群早熟的苦难青年，开始敏感到中共统治者为了争夺权力，不愿照旧统治下去了。而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中苏醒了中国人民也不愿再照旧被统治下去了。这应该是中国工人阶级实现自己真正当家作主的一个不算太好的机会。但当时怎样去利用这个机会，我和李伯特等人仍然心中无数。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我们走进了历史。

那就是文革初期贵阳的“六六事件”。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敏感的知识分子结合贵阳六中和贵阳九中、十中的少数敏感学生去《贵州日报》提意见。当天，我正从代课的贵阳洛湾小学请假进城参加六六届高考的社会青年体检。途经《贵州日报》社门口，看见一群人在贴大字报，四周围观的人被军警包围，几部摄影机忙着拍摄实况。我停住脚好奇地观看了几分钟就赶着去体检。谁知这几分钟就惹了大祸。几天后，中共贵州省委下达了所谓“六九反击令”，把学生和知识分子向《贵州日报》提意见和贴大字报的行为打成所谓“反革命事件”，不知当天在我停脚观看的几分钟内，有熟人看见我去告了密，还是自己被中共特务的摄影机拍了镜头，我也莫名其妙地被牵涉到事件中去。半个月后，校长正式通知我回城接受审查。

我回到家，因重病取保外医的父亲在被斗争后已经收监。家中人去楼空，只留下泪痕满面的苍老母亲。回家当天，我居住地的“工作组”和贵阳市公安局的人员开始对我轮番审讯，审来审去审不出什么名堂，在七月初正式把我母子送进所谓“牛鬼蛇神专政队”，押往贵阳城郊的东山岷口打儿洞“劳动改造”，每天在盛夏的酷阳下锤小石子，一锤就锤到九月上旬，成为刘少奇等派出的“工作组”打击镇压的牺牲品。

八月中旬，“十六条”已经公布。毛泽东已公开在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一个“破四旧”的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幸好我那时已到城郊“劳改”，李伯特也被下放到农场劳动，躲过了“红色恐怖”这一劫。而到了九月中旬，毛泽东打击的目标日渐明显，和“老红卫兵”不同的是出现了一批蒯大富、谭厚兰等真正理解“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革命红卫兵”。这批“革命红卫兵”为了传达圣意，也参加了串连。所以，八月底到九月初，贵阳来了不同于第一批“南下串连队”的第二批“南下串连队”。这第二批不像第一批那样杀人越货，而是到各学校、各工厂去煽风点火，发动群众“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两派群众的大辩论代替了一边倒的血腥镇压。而在第二批“南下串连队”的游说鼓动下，贵阳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而这时，工作组已经被撤走。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劳改队”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自行解散。在和李伯特商量后，我决定到北京上访告状，同时观察各地运动的情况和了解北京上层动态，以便在合适的时候采取行动。——当然，至于要采取什么行动，我和李伯特也说不出。

我于九月底到达北京，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分配住到西直门内大街一条小胡同内的原冶金部第二招待所（当时临时改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招待所”。和我同一寝室的有来自湖南长沙的杨政、安徽蚌埠的裴燕柱、江苏无锡的吴永湖、广西桂林的周泉等人。因为中共当时是按系统、按行业分配住宿，所以我们住在一起的都是各地上访的临时合同工。几乎每人都有一段悲惨经历，而且大部分都被解雇，贫病交加，同病相怜。大家对造成自己这样苦难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同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有的正式工虽然在政治上受迫害，但至少工资照发，有一碗饭吃。而我们临时合同工一旦在政治上出了问题，马上被一脚踢出单位大门，连饭也吃不上了。所以临时合同工制度成了我们抨击痛恨的首要目标。

我把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完成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给大家传阅，大家都感到我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心里的话。杨政提议，把这篇文章印成传单，散发到社会上去，希望广大临时合同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这份刻写油印的传单于六六年十月六日在工人体育场公开散发。当天，“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有将近十万各地来京的师生和工人参加。

《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印成传单散发后，在临时合同工中造成很大反响。从十月六日下午开始，许多外地来京的临时合同工和北京本地的临时合同工按传单上的地址找上门来，我和杨政等人在那段期间日夜忙于接待来访谈者，记得当时来的以后又成为“全红总”各级负责人的有北京的李云臣（后改名叫李卫兵），江苏的慕纪群、慕纪雄兄弟，安徽的杜某某（名字已忘）等人。

十月八日开始，毛泽东主持了中共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检查，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更加清楚。杨政和我商量后，决定组成一个争取临时合同工权益的组织，当时决定起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参加发起的人除了我与杨政之外，还有前面所述的李云臣、吴永湖、裴燕柱、慕纪群、慕纪雄、周泉、杜某某等人。

当时我提出大家都回家乡去，建立各地的基层组织，北京留下杨政等和北京本地的李云臣保持联络，等到六七年一月一日再回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总部。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我于十月下旬离京南下返回贵阳。

## 二、全国总部正式成立和第一个地方分部成立

我回到贵阳后，首先找了李伯特、叶文筑等人。他们都认为：我们家庭出身不好，不适合站在第一线，应找一些出身好的人参加筹建贵州分部。叶文筑提议，找他的一位朋友毛胜年来参加筹组贵州分部。这位毛胜年是叶在水城修公路时认识的一位筑路合同工。如同当年刘备流落江湖一样，这位毛胜年也是一位落魄的皇亲国戚——他是毛泽东的远亲。

十一月初的一天早晨，叶文筑把毛胜年带到我家。毛胜年很直爽。他也不知道我们对他的最大兴趣是他和毛泽东的“亲戚关系”。所以他一入座，就作了自我介绍。他就，他的家乡是湖南平江，平江起义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组成部分。他的祖先和毛泽东的祖先是同宗，因此，可以算是毛泽东的远亲。他告诉我们，他的伯祖父名叫毛简青，是中共六大的湖南代表，也是平江县的首位中共县委书记，是平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和彭德怀是知交。现在他的祖父住在平江，是中共平江起义纪念馆的负责人。而中共平江起义纪念馆则是他家的房子。

毛胜年介绍自己后，表示他早就想造“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反，只是苦于在理

论上不行，又缺乏志同道合的朋友。他说，他看过我写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后很感动。他希望参加我们的筹建工作。他表示大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今后就是赴汤蹈火，他也在所不惜。毛胜年的直爽、豪气和亲切感动了我。我表示欢迎他参加我们的队伍，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适合牵头，希望他来当贵阳分部的出头露面的人。他表示他理解我的处境，欣然接受了。

十一月初，杨政从北京打电报给我，告知李云臣把北京分团的架子搭起，北京还来了两位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参加筹建工作，他们是王振海和郝维奇，都是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的临时资料员。湖南长沙也来了两位组织能力很强的人，他们分别是长沙岳麓山化工厂的合同工罗运泉和长沙大信织布厂的廖闽夫。杨政说，他们希望提前建立全国总部，不一定等到六七年元月，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当晚回电告诉他若条件具备，可以先在北京把全国总部建立起来，这样也许对各地建立分部有好处。但我希望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等到全国有半数以上的省、市、自治区有了分部才召开。

十一月五日，杨政再次发来电报。他说，现在各地进京的临时合同工很多，建立全国总部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我立即动身北上，参加十一月八日的全国总部成立大会。我电告杨政等人，如期在十一月八日把组织建立起来，不必等我北上。而我一待贵州分部建立，将立即北上。

十一月八日，全国总部在北京冶金部第二招待所宣告成立，把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化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并简称“全红总”。安徽的杜某某因是中共党员，复员军人，出身很硬，当选这“全红总”全国总部总指挥。无锡的季某某当选为副总指挥（季某某是无锡一零一八兵团的负责人，当时未出席会议，缺席当选）。北京的王振海当选为秘书处秘书长，我则缺席当选为副秘书长。秘书处秘书有罗运泉、廖闽夫、郝维奇、慕纪群、慕纪雄，连同王振海和我共七人，是“全红总”的领导集体。秘书处的分工为：王振海、郝维奇负责筹建北京分团。我负责筹建贵州及各外省分团，兼管理论和组织工作。罗运泉、廖闽夫负责和中央各级机关的联络工作。慕纪群、慕纪雄负责内部的总务工作。此外，任命了组织部长杨政、宣传部长龙云学、联络部长裴燕柱、接待部长张德明，北京分团筹备组长李云臣。

“全红总”十一月八日宣告成立后，当天就在罗运泉、廖闽夫带领下，由首批成员五十多人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并给予注册登记。但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书记处书记王志杰等人并没有把“全红总”的这五十来号人放在眼里，根本不予理睬。因此，这一静坐，直坐到十一月十八日，人数则由五十多人增加到三百来人。王志杰等人看十天来“全红总”的声势越来越大，不理睬不行了，连忙向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马纯古、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报告，马纯古又向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工交口的副总理李富春作了报告。李富春表态不要把事态扩大，要王志杰等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全红总”造“临时合同工制”的反。十一月十八日，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口头上承认了“全红总”是合法的造反组织，“全红总”成立后的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全红总”获得全国总工会正式承认后，筹建中的贵州分部也把争取得到贵州省委承认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胜年和我到了贵州省委办公厅，但已无人办公。只有一个年青的锅炉工，我们问他省委的人到什么地方去了？他问我们找省委哪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为什么去找？我和毛胜年向他说明来意，并把油印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送他一份。他很快看完了《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后告诉我们，他也是一位合同工。

，也深受“临时合同工制度”所害。他当即表示要参加我们的组织，他告诉我们他姓朱，名字我已经忘了。他要我们第二天上午来找他，他会把打听到的消息告诉我们。

第二天一大早，小朱告诉我们，现在省委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在省人民政府交际处举行，在交际处负责会议的是省委孙副秘书长。我和毛胜年乘车到了城北的交际处（省委在城南）。按照小朱给的房间号，果然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孙副秘书长。

这位孙副秘书长误以为我们是南下串连的北京学生。他一面给我倒茶倒水，一面问我们是北京哪间大学的？我们告诉他，我们是革命造反组织的，目的是要求省委承认我们组织的合法性。他一听我们是群众组织的，他连忙问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我们告诉他，我们口号只有一条：“改革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他接着又问，我们要改革哪些“上层建筑”？我们告诉他，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我们是要造这个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的反，争取临时合同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他听后松了一口气。也许在他的心目中，我们提的口号和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他说，他很支持我们造一切剥削制度的反。他说，“我们党革了四十几年的命，建了十七年的国，是不应让工人吃苦了。工人的工资、福利、劳保是应该改一下了。斗来斗去，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群众还会支持我们、拥护我们吗？”他说，可惜他身为省委干部，要不他会参加我们的组织。现在社会很乱，希望我们这个组织迅速壮大起来，能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说他会尽快把我们的要求向省文革和省委报告，要我们次日下午二点来这个房间听他的回话。

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半钟，毛胜年和我如约来到交际处。孙副秘书长面带喜色地告诉我们，省文革和省委常委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召开常委联席扩大会议，邀请毛胜年和我参加。二十五日晚八时许，毛胜年和我参加李再含主持的这个会议。在会上，我介绍了“全红总”在北京获得全国总工会承认的情况，要求省文革和中共贵州省委也承认贵州分部。会议决议承认“全红总”贵州分部。当场，省委常委陈朴如、张一樵在我拟的报告上签字正式承认贵州分部。

十一月二十七日（周一），我们按省委给的地址在贵阳市总工会找到了官方的“工人联络站”负责人沈争真。由他出告公函给我们刊刻了公章印信，拨出贵阳市新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左侧的办公室给我们使用，并决定给我们一笔专用活动经费，金额是每天可以实报实销人民币二千五百元，成为贵州省专用经费报销额最高的群众组织。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召开贵州分部第一次正式会议。会议选举杨同春（中共党员）为总指挥、我为副总指挥兼秘书长，毛胜年为副总指挥，李伯特为组织部长，邓德礼为宣传部长，杨爽秋为联络部长，赵琳为内务部长。当天我向北京的“全红总”全国总部发了电报，当天夜间收到了全国总部罗运泉、廖闽夫署名的贺电。这样，继“全红总”全国总部十一月八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后，“全红总”的第一个地方分部——贵州分部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贵阳正式成立。

### 三、封闭劳动部，进驻全国总工会和江青接见

十二月一日我和毛胜年一道以贵州分部代表的身份北上，十二月三日到达北京。这时，“全红总”正在全国总工会八楼进行预计为期十天的第二次静坐。这次静坐有各地临时合同工赴京代表三百余人，目的是要求“全总”把对“全红总”的口头承认落实为合法注册，刊刻公章印信和拨给活动经费。



我和毛胜年一到北京，罗运泉和廖闽夫就把他们拟的“全红总”宣言草稿交给我，要我根据《论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内容修改补充。经过十二月三日的一夜奋战，“全红总”宣言终于定稿付印，并于次日正式发表。十二月五日，北京分团正式宣告成立，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近三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王振海和我到场讲了话。紧接着，“全红总”的湖南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上海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古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相继在各地成立。一场为临时合同工，同时也为正式工争取权益的声势浩大的风暴席卷了中国。

十二月六日，全总马纯古和劳动部党组负责人联名向李富春和中共中央送了《关于如何解决临时工、合同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提请中共中央重视“全红总”领导的全国性的临时工合同工造反问题，指出临时合同工制度如不加改革的严重性。在当时的中央工交口会议上，李富春向周恩来作了关于“全红总”的汇报。周恩来表示应予正确疏导。十二月八日，全国总工会经过李富春批准，终于正式为“全红总”刊刻了公章，办理了注册手续，并和“全红总”再达成“会谈纪要”，表示支持“全红总”的革命行动，同意在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临时合同工，并决定和“全红总”确定再次会谈研究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全红总”原来预计十天而实际静坐了八天就取得了胜利。

十二月十日，“全红总”召开总部扩大会议协商筹备与全总、劳动部会谈具体方案。会上，罗运泉提出成立会议筹备组专司会议筹备事宜。但任总指挥的杜某某表示不同意，但他的意见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而被否决。当时，杜某某和慕家兄弟及裴燕柱四人宣告辞职并退出“全红总”。杜某某退出“全红总”后即和一批复员退伍军人组织了“红旗军”，以后也遭到中共镇压和取缔，这是后话。杜某某等人退出后，“全红总”不得不立即进行改组，这是“全红总”的第一次改组。这次改组把原秘书处改称为“五人小组”（对外称秘书组），宣布一切权力归“五人小组”。“五人小组”由王振海、我、罗运泉、廖闽夫、郝维奇组成。分工是王振海负责北京分团，我负责理论日常事务的处理，罗运泉、廖闽夫专司对上联络，郝维奇负责对其它群众组织的联络和科委系统的“全红总”分支组织的组建。此外，任命了毛胜年任组织兼内务组长，杨政任保卫组长，唐静任宣传组长，韩琳任联络组长，张德明任接待组长，王振海兼任北京分团团长。

从十二月十日开始，我除了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外，每天晚上都要拟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和回复一些重要的电报和信件。电报多是各地分团的请示报告，而信件则多为各地临时合同工受解雇、受剥削、受压迫的严重情况。当时各地投诉的信件每天多达二千来封，从这些信件和各地分团的来电中可以看到，各地解雇临时合同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发生多起被解雇后的工人自杀事件。

罗运泉、廖闽夫天天去找全总和劳动部的王志杰等人，希望他们早日与我们会谈，通过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并报国务院批准。但一碰这些具体问题，这几位部长、书记总是一拖再拖，迟迟不确定会谈的日期。到了十二月二十日，年关将近，各地的投诉电报、信件日益增多。每天已经不是几千封的问题了，而是几大麻袋。但内容都是相似的，而且情况越来越紧急严重。十二月二十日我们再次召开总部扩大会议，责成罗、廖二人向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二十三日确定三方会谈日期。罗、廖二人结束会议后立即赶到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向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

十二月二十二日，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共同答复“全红总”，确定三方会谈订于次日在劳动部礼堂召开。我们松了一口气，分头作好会谈资料的准备工作。十二月二十三日，劳动部来电话通知会谈延期至次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劳动部又来电话将会谈延期到次日。这两次延期引起所有总部委员的愤怒，“全红总”召开了总

部会议，并作出一致决议：如果明天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再拖延日期，就在当天先把劳动部封闭，十二月二十六日再把全国总工会封闭，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表达我们要真正当家作主的决心和力量。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作了如下安排：

一、王振海立即到北京分团，动员北京分团全体团员处于紧急待命状态，动员人数不得少于五万人。

二、总部委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王振海和我、杨政带领，专门准备主持北京分团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行动。其中，我负责拟定王振海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时的发言，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后发表的宣言和声明。杨政负责组织三百人左右的纠察队，以维持秩序，力争行动中不伤一人，不毁一物。另一部分由罗运泉、廖闽夫、郝维奇带领，先期进入全国总工会维持全国总工会的秩序和现状，准备迎接大队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封闭全国总工会。

三、拟定这次行动的口号：①向刘老板算总账的时候到了！②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③我们要革命，要生产，要吃饭！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主动到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联络的罗运泉、廖闽夫带着绝望和无奈的口气打回电话：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仍然耍起拖拉推延的老花招——竟然又把决定在二十五日召开的三方会议推延了，而且这次是无限期的推延。我把电话放下后，立即通知总部委员根据昨天的决议进入自己的位置。我拨通了王振海的电话，要他在下午两点前把人马带进天安门广场，两点正准时集合，进行动员，开始行动。

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北京分团开着数辆宣传车，准时而有秩序地进入天安门广场。北京分团当天可能来了五至六万人，把金水桥的两侧都站满了。两点正，王振海在一辆宣传车上讲话，布置了今天的行动。在王振海讲话的时候，许多外地来京的临时工合同工和上访者，串连学生闻讯赶到天安门广场，加上围观的群众，人越来越多，长安街的交通终于阻断了。人群一直站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王振海讲话结束后，队伍在宣传车的带领下徐徐移动。我随杨政率纠察队先行到达劳动部，经过我们的解释和说明，工作人员也乐于回家，所以，纠察队的百余人在劳动部的造反组织的配合和带领下，迅速封闭了劳动部除礼堂、二楼会客室和总机房外的一切办公室，并站好了位置，以防不测出现。王振海带领的大队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到达，把劳动部围得水泄不通。王振海再次通过劳动部的广播系统发表谈话，宣读声明，宣布纪律，直到八九点钟，队伍才慢慢散去。

二十五日晚深夜十二点左右，我和王振海等总部委员正在劳动部二楼会客室休息，几位纠察队员忽然带着两名军人进入会客室。他们一进门就要找王振海和我。这两位军人说：“请不要误会！我们是中央文革的联络员，是奉中央文革的命令来支持你们的！”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喊起了口号：“感谢中央文革！感谢江清首长！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毛主席！”一时间，口号声和掌声此起彼落，这两位军人和王振海与我又握手，又是拥抱，真是否忙得不亦乐乎。这也是这次封闭行动第一次出现拥毛拥江拥中央文革的口号。

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军人自我介绍是“解放军报”的编辑，名叫邵一海。他把我叫到一旁，压低声音说：“毛主席七十三寿辰的晚上（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中央文革首长要接见你们。为了首长的安全，你必须从现在起保密，绝对保密！希望你把总部人员的档案交给我们，便于中央审查和决定参加接见的人员，现在就走，好吗？”我把情况悄悄告诉王振海，要他通知所有总部委员在二十六日下午三点钟前

集合，不得有误，其中包括他自己。说后乘坐邵一海等二人开来的一辆华沙牌小车回到总部，把所有总部委员的档案副本交给邵一海。

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许，邵一海只身来到西什库，交给我一张打印好的名单，一共有十五人。他告诉我，中央文革决定接见这十五名“全红总”的代表，要我分别秘密通知这十五个人。当天晚上七点钟，一辆大客车如约准时到达。我们上车后，车子先开到平安里《解放军报》社大院内停下，然后上来两位军人。邵一海向我们介绍，这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人民日报》代总编唐平铸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胡痴。在大家的掌声中车子开动，直奔向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直到停车坪，几排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们下车后在邵一海等人带领下，穿过这长长的军人队伍，在这些军人的敬礼和鼓掌中进入了东大门，到达东会议厅。此时我看挂在墙壁上的大挂钟，正是七点四十分。

我们坐下片刻，正当时针指到七点五十八分时，江青率领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进入东会议厅。江青一进门就大声说：“同志们好！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在大家的口号和掌声中，江青先按邵一海给的那张名单的名字一一点名，并问每人的情况后才入座。

江青坐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这次接见从当天晚上七点五十八分开始直至次日凌晨零点三十四分为止，长达四小时三十六分。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全红总”代表的发言和江青等和劳动部两个副部长鄱占元、李正亭及全国总工会书记王志杰的问答，其余的约三分之二的 시간은江青讲话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的简短插话。江青讲话长达两至三小时。会上我和唐静、邵一海都作了记录。而我用速记方式的记录使用了几十张纸。会后“全红总”印发的江青讲话仅四千来字。这份记录是我在当天晚上连夜整理后交《工人日报》铅印的。除了这份记录外，邵一海等也印发了另一份更简短的打印记录。现在这两份记录的传抄件都流到海外，这就是所谓江青讲话记录的两个版本的由来。在这次接见中，江青当场要“全红总”代表拟一个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通知。这个通知当即由我草拟并交给江青过目。内容是：

- 一、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
-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 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被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临时工，应宣布立即平反，赔偿损失。

江青接过我拟的这个“三条”，和陈伯达、康生交换看过后说：“我建议修改一下。其中第三条在‘十六条’中和中央军委的平反命令中已经提到了，不必再提。我听说合同工队伍中有不少地富反坏右分子，除了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也要给他们一碗饭吃，我看这样修改好不好？——”接着，她念了她亲手修改的“三条”。其中一、二条不动，只是第三条作了如下改动：“现行反革命分子除外”。在整理这份记录时，我感到这样提不妥，打电话给江青，经她同意修改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按十六条处理。”

在这次接见中，江青还要“全红总”办三件事：一是开一个中型的控诉大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二是拟出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上报中央。三是到门头沟煤矿作一次调查，立即将材料交中央文革。接见结束时，江青给我留下她的电话，并指定唐平铸、胡痴、邵一海作联络员。从此，直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六日，邵一海基本上常驻“全红总”。江青接见后的次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全国总工会派出数辆大小汽车，把我们接去，办公在全总大楼，住宿在小灰楼。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全总陷入瘫痪，“全红总”主持了原全总的一切工作。作为一个独立的

工会组织，“全红总”完全取代了官方的“全总”，直到“全红总”被中共取缔。在江青接见我们的当天——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而中共迎接来的是什么“新高潮”呢？这个“新高潮”并没有按毛泽东的旨意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了中共的剥削制度。一场波及全国、声势浩大的争政治平等、同工同酬、改善福利待遇、补发拖欠工资的工人运动汹涌而来了。（未完待续）

□ 原载《北京之春》第46期（本刊有删节）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           |           |                                                                  |
|-----------|-----------|------------------------------------------------------------------|
| 本期责任编辑：   | 华新民（美国）   |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本期 校对：    | 王葆庆（美国）   |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读者技术咨询：   | 徐名扬（澳大利亚） | < <a href="mailto:cnd-help@cnd.org">cnd-help@cnd.org</a> >       |
| 网络技术维护：   | 冀 城（加拿大）  | < <a href="mailto:cnd-info@cnd.org">cnd-info@cnd.org</a> >       |
|           | 何 为（美国）   | < <a href="mailto:cnd-info@cnd.org">cnd-info@cnd.org</a> >       |
| 《华夏文摘》主编： | 李彤彬（美国）   | < <a href="mailto:cnd-cord@cnd.org">cnd-cord@cnd.org</a> >       |
| 《CND》总编：  | 熊 波（美国）   | < <a href="mailto:cnd-manager@cnd.org">cnd-manager@cnd.org</a> > |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mailto: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mailto: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ftp://ftp.cnd.org)[149.159.2.6]：pub/hxwz  
或 [canada.cnd.org](ftp://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